

张忠民 陆兴龙 李一翔·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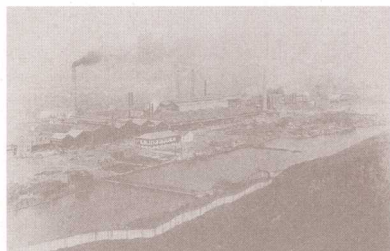
近代中国 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

JINDAIZHONGGUO
SHEHUIHUANJING YU
QIYEFAZ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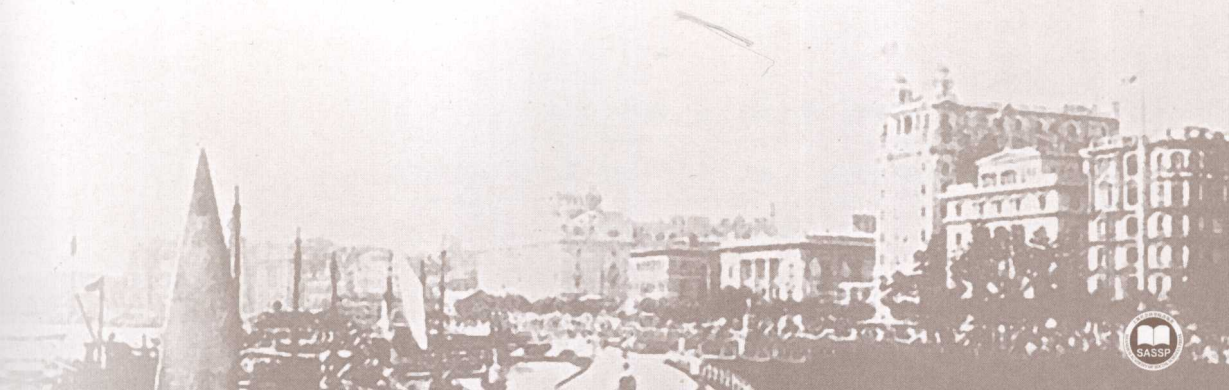
张忠民 陆兴龙 李一翔 ·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近代中国 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

JINDAIZHONGGUO
SHEHUIHUANJING YU
QIYEFAZH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 / 张忠民, 陆兴龙,
李一翔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745-153-2

I. 近… II. ①张…②陆…③李… III. 企业—经济史—
研究—中国—近代 IV. F27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6302 号

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

主 编: 张忠民 陆兴龙 李一翔

责任编辑: 杨 国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 //www. sassp. com E-mail: sassp @ sass. org. 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3.75

插 页: 2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80745-153-2 / F·026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2007年7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上海市经济史学学会在上海联合举办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企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本书即是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会议论文的结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自1956年成立以来,经济史就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学科之一,而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企业史则是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初,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迭起,在著名前辈学者张仲礼、丁日初、马伯煌、姜铎等的带领下,即从收集企业史和行业史资料入手,开始了对当时被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外国资本主义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等典型企业、行业的开创性研究。到80年代前期,先后编写和陆续出版有关企业史、行业史的研究专著和史料集多达30余种。其中包括大隆机器厂、恒丰纱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公司、江南造船厂、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外商英美烟公司、沙逊洋行、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等一批历史悠久的近代著名企业的企业史和企业史料集,以及近代上海机器、造纸、缫丝、丝织、卷烟、面粉、五金、百货、棉布、土布等工商业行业史。80年代后期,经济研究所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又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顺应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潮流,在各有关企业的支持和合作下,陆续编写和出版了包括上海轴承公司、新光内衣厂、中华制药厂、新亚药厂、中西药厂、海普药厂等企业史在内的中华企业史丛书。90年代以后,顺应国内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现实需求,以及制度经济学的学术潮流,经济研究所的企业史研究更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企业制度史、金融史,以及企业制度发展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拓展,并且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色,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长期以来由张仲礼、丁日初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与国内外同行广泛、持久的学术交往与联系。早在1992年,经济研究所就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由美国罗斯基金会资助,成立了中国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中心收藏有弥足珍贵的旧中国中外企业、行业的历史档案、经济资料 and

大量的旧报刊有关经济资料方面的剪报,以及各种专业藏书。此外,在与国内外同行广泛、持久的学术交流、联系中,除了参加国内各种学术讨论会,接待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的访问交流,收集文献资料外,不定期举办以“企业与企业制度史”为主题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亦是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史研究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学术前沿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把握学术研究趋势的重要形式。

自 1988 年以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曾经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题,举办过多次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给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留下了良好的学术影响。进入 21 世纪以后,2002 年 8 月,在国内外学者的热情响应和参与下,我们以关注学科前沿、回应时代挑战,在比较中迈向经济史研究的国际化为主旨,再次举办了以“企业与企业制度史”为主题的《企业制度·企业家精神·城市经济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后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收录了包括企业制度研究、企业史与企业家个案研究、企业外部环境与城市经济联系等内容在内的 29 篇学术论文。

2006 年 8 月,在庆祝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 50 周年之际,我们又举办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组织·结构·制度”国内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宁夏、四川、湖北、江苏、浙江、福建、上海等地各高校、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递交了 38 篇卓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其内容包括企业制度与企业史研究、金融史研究、工商团体研究,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史等方面。

2007 年 7 月,“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企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是我们以“企业与企业制度史”为题的又一次海内外学者的学术聚会。此次会议一共收到论文 32 篇,经会后专家学者的修改以及我们的编辑,最后收录了其中的 30 篇,结集成书。

这 30 篇论文,以其研究对象的粗略归类,大致上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企业制度与企业史的总体研究。

前辈学者张仲礼教授《关于近代中国外资企业在华创业和发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在多年来研究近代中国外资在华企业的基础上,提出了近代中国外资大企业的创始资本是否都是来自外国,以及来华以后的发展壮大过程是否完全依赖于外商本身的经营管理能力等问题,并作了精辟的分析。日本学者久保亨《关于企业管理公司的新思考》,是在认真研读和分析了以往学者对 20 世纪 30 年代以“诚孚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管理公司的研究之后,对企业管理公司的职能、作用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认为对于这种企业管理公司的存在和活动,不能无条件地给予很高的评价。南京大学李玉教授《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注册制度研究》,以当时的《政府公

报》、《农商公报》等为主要史料来源,考察了在以往的公司制度研究中尚未详论的北京政府时期的公司注册问题,认为虽然其旨在促使公司依法注册,规范运作,但实际实行中的文牍往返,层层转接增加了公司负担,不利于调动民众的创业积极性。台湾学者刘素芬《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奖励政策——以特种工业奖励法为例(1929~1934)》,则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大量的珍贵馆藏档案为依据,讨论和分析了抗战之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奖励政策,认为之所以出现成效不彰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利用民间企业发展国营事业的错误政策,以及社会缺乏法治观念。张忠民的《略论南京政府时期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及其分配》,所涉及的是在以前有关研究中很少为人关注和讨论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有企业的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朱婷的论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规模估计的问题与方法》,主要是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档案资料为依据,提出了自己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规模估计的见解和方法。贺水金的《1945~1949年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反通货膨胀政策及其绩效评析》,讨论的是战后中国企业发展中的一种宏观环境,即通货膨胀的问题,认为中央银行在抗战胜利之后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抑制通货膨胀,但由于政府根本没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因此所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充其量只不过是某一时点上起到了缓和物价上涨的作用。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中行业问题的研究。

日本学者富泽芳亚的《1930年代中国银行与冀豫晋三省纺织工业的重组》,讨论了1930年代冀豫晋三省纺织工业重组中,中国银行所起的作用,所揭示和讨论的是近代中国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纺织行业生存、发展与金融业的关系。日本学者城山智子的《公司借款:20世纪初期上海纺织公司的筹资问题》,尽管讨论的同样也是纺织行业发展中与金融业的关系,但是所研究的对象已经是20世纪初期的上海纺织业,进一步探讨的则是银行与企业关系演变的背景和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刚的《列强主导格局下的中国民族企业行为——以近代棉纺织工业企业为例》,讨论的虽然也是近代中国的棉纺织业,但关注的视角已经完全移向中外企业的竞合关系。文章以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行为为个案,考察了在西方列强主导我国经济格局下,民族企业行为的“变异”。杨在军的《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家族化实证分析——以机器纺织企业为中心》,虽然研究的对象还是近代中国的机器纺织业,但其研究的重心已经不是纺织行业本身,而是以纺织行业为例,讨论和揭示近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家族化问题。戴一峰的《制度变迁与企业发展:近代报关行个案研究》则以近代福建厦门的报关行为例,

在研读和利用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讨论了在以往的企业史研究中,较少有人关注的近代报关行这一特殊的行业,以及它们的经营和制度特色。李一翔的《近代中外合资银行的经营特色刍议》,探讨的是在近代中国存续了30多年的中外合资银行的经营特色,指出无论是这些银行早中期的繁荣兴旺,还是末期的中落倒闭,都无不与其的经营特色密切相关。

第三部分主要是对于企业史个案的研究。

美国学者高家龙《企业与家庭关系——上海刘氏家族》,在多年来研究刘鸿生企业的基础上,以刘氏家信为依据,对近代中国的家族关系网和家族企业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父亲势力总是遍布中国家族式企业这个传统看法也许值得再斟酌”。美国学者关文斌的《网络、层级与市场:久大精盐公司(1914~1919)》,则以近代中国著名的久大精盐公司为例,探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网络、层级与市场相结合的策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内部层级,以及社会经济学的社会网络分析这三种企业原则,至少在“久大”这一个案中是可以相互为用的。赵津等的《从模仿到创新——范旭东企业集团技术发展模式分析》,以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为例,分析了近代中国民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技术模仿形成本地化生产能力,进而在自身研究和开发基础上实现技术突破和创新的路径与模式。陆兴龙《申新纺织公司扩张时期经营状况分析》,对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大加赞赏的申新纺织公司1916~1931年间的高速扩张进行了质疑,认为若对申新当时的财务档案进行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在其企业的内在脆弱及空洞,申新纺织公司的扩张并不能说就是成功的资本运作。宋美云《董浩云与近代天津航业公司》,讨论的是现代中国航运业巨子董浩云在自身创业之前,对天津航业公司的贡献,以及在此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经营理念、管理才能和民族意识,揭示了董浩云日后成功的内在潜质。朱荫贵《从招商局的历史看近代中国的政企关系》,以近代中国著名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为例,探讨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政企”关系。指出在近代中国的政企关系中,政府始终处于一种强势的地位。这种相当不平衡的政企关系已经成为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远不如意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邢建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舞弊案的应对》,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以及口述资料为依据,讨论了近代上海金融企业经营管理中真实存在的内部管理人员的各种舞弊现象,以及银行对舞弊问题的防范及应对。杨天亮《中国旅行社与“服务社会”理念(1923~1949)》,以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发展起来的中国旅行社为例,探讨了近代中国企业如何正确处理“近利”与“远功”,服务社会与企业生存赢利之间的关系。王强《“商战”与“商情”:试论近代在华英美烟公司商业情报活动》,讨

论了英美烟公司在近代中国的市场开拓中是如何重视商情的搜集和利用,认为英美烟公司的商业情报活动表明及时获取和利用商业情报是近代外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前提和保障。吴静《试论抗战时期刘鸿生火柴企业的技术内化及其发展》,以抗战时期刘鸿生的火柴企业为例,指出近代中国科技落后,民族工业主要是在引进外国技术基础上兴起,但引进技术并加以内化创新,才是塑造民族企业真正的活力所在。

第四部分主要是关于近代企业发展过程中工商业组织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研究。

陈争平的《近代工商社团行业管理功能的SWOT分析》,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的SWOT分析法,即对企业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的分析,认为利用SWOT模型可以使我们对近代中国的工商社团的行业管理功能的认识更具系统性。王玉茹等的《流通市场分级与关系网络的构建——近代上海绸缎业商人行业组织研究(1900~1930)》,提出了辐射式和集散转移式的流通市场分级,以及私人关系网络和商人行业组织关系网络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1900~1930年间传统产业中商人行业组织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樊卫国的《近代上海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经济协调作用——以近代经济群体为中心》,以经济群体为中心讨论了近代上海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经济协调作用,认为作为上海非政府组织主干的经济群体,在近代政府管理相对疏略和法律、法规不甚健全的条件下,发挥和执行着民间经济社会的均衡协调和社会控制功用。陈正卿《浅论民国时期的工业团体问题》,讨论的也是近代中国的工商业团体问题,只是讨论的对象集中于工业团体,所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业团体与抗日及国货运动的关系,工业团体与民族资本特点的关系,以及工业团体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关系等等。戴鞍钢《简论洋务运动的地区差异性》,则以洋务运动中的洋务企业为对象,讨论了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近代企业的地区差异性问题。认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办,主要不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是借助于外来资金和技术的注入,因此它们的重点始终是着眼于中国的东部地区。陈计尧《近代中国买办制度再议——以买办契约为中心讨论(1860~1940)》,以其长期收集的买办契约为依据,从微观的角度对近代早期企业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即买办制度进行了再探讨,认为近代中国买办制度的变迁,关键在于买办契约安排中所产生的内在利益、风险与产权等结构性问题。乔兆红《中国博览会事业的衰变与趋新》,探讨的尽管是近代中国的博览会问题,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博览会事业的发轫和缘起,一开始就与商人、国货、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博览会事业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及民族企业发展的过程。

综观本书所收之论文,虽然具体选题以及分析的思路 and 对象各有不同,但是以其所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这些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理念、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体现了当今海内外经济史学界,对于近代中国企业史研究共同关心的问题、发展的趋向,以及所达到的学术水准。如果以研究的共性来说,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有两个方面的方法论问题是尤为明显,即一是“制度”,二为“关系”,或者说是“网络”。所谓制度,是说本书所收的论文,几乎都不同程度的带有“制度研究”的痕迹,可以说是从宏观、微观各个不同的视角,对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中的制度问题进行了各有千秋的探讨;而所谓的“关系”或者说“网络”,则表明上述论文有很多都是从关系和网络的角度,对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视野的探索。所表现出来的是,在这些论文中,我们的学者,我们的研究,尽管都是以历史资料为依据,所研究的大都是某一具体的问题,但是,论文的作者,谁都不满足于简单的“讲故事”式的历史事实陈述,而都力图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分析的框架,有一个观察的视角,有一个理论的归纳和分析;而且,这一分析框架,这一观察视角,又必须具有学术探讨的共性,必须具有建立学术范式的可能。可以这样说,在本书所收的这些论文以及在这些论文的讨论过程中,绝大部分的学者,几乎都认同在当前的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制度问题和网络关系,已经成为我们思考和解读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和方法。由此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在经济史的研究中,资料、档案固然重要,但是,研究的理念、理论、方法则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所收的这些论文,一定程度上确实体现了经济史学界对近代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新水平,并且展示了今后一段时期研究的趋向。

最后,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以及编辑上的原因,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黎志刚的《民生公司和战时重庆的经济发展》,以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李培德的《人际网络和制度网络的相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行制度的分析(1916~1937)》,未能收入本书。但我们仍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读者们能在其他场合拜读到他们的大作。

目 录

前言	(1)
关于近代中国外资企业在华创业和发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张仲礼(1)
关于企业管理公司的新思考	[日]久保 亨(5)
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注册制度研究	李 玉(11)
南京国民政府工业奖励政策之检讨	
——以特种工业奖励法为例(1929~1934)	刘素芬(21)
略论南京政府时期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及其分配	张忠民(50)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规模估计的问题与方法	
——以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的规模估计为例	朱 婷(64)
1945~1949 年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反通货膨胀政策及其绩效评析	贺水金(75)
1930 年代中国银行与冀豫晋三省纺织工业的重组	[日]富泽 芳亚(93)
公司借款:20 世纪初期上海公司的筹资问题	[日]城山智子(114)
试论列强主导格局下的中国民族企业行为	
——以近代棉纺织工业企业为例	林 刚(125)
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家族化的实证分析	
——以机器纺织企业为中心	杨在军(140)
制度变迁与企业发展:近代报关行初探	戴一峰(158)
近代中外合资银行的经营特色刍议	李一翔(176)
企业与家庭关系	
——上海刘氏家族	[美]高家龙(188)
网络、层级与市场	
——久大精盐有限公司(1914~1919)	[美]关文斌(194)

从模仿到创新

- 范旭东企业集团技术发展模式分析…………… 赵 津 李健英(206)
- 申新纺织公司扩张时期经营状况分析…………… 陆兴龙(216)
- 董浩云与近代天津航业公司…………… 宋美云(226)
- 从招商局的发展历程看近代中国的政企关系…………… 朱荫贵(235)
-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舞弊案的应对…………… 邢建榕(251)
- 中国旅行社与“服务社会”理念(1923~1949)…………… 杨天亮(257)
- “商战”与“商情”:论近代驻华英美烟公司的商业情报活动 …… 王 强(273)
- 试论抗战时期刘鸿生火柴企业的技术内化及其发展…………… 吴 静(285)

近代工商社团行业管理功能的 SWOT 分析 …… 陈争平(294)

流通市场分级与关系网络的构建

- 近代上海绸缎业商人行行业组织研究(1900~1930) …… 王玉茹 张 玮(304)

近代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经济协调作用

- 以近代上海经济群体为中心…………… 樊卫国(315)
- 试论中华民国时期的工业团体问题…………… 陈正卿(328)
- 社会环境与洋务企业的地区差异…………… 戴鞍钢(337)

近代中国买办制度再议

- 以买办契约为分析中心(1860~1940)…………… 陈计尧(347)
- 中国博览会事业的衰变与趋新…………… 乔兆红(359)

关于近代中国外资企业在华创业和 发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上海社会科学院 张仲礼

解放初,中国政府曾对中国外资企业状况进行过调查。调查报告指出,英商企业在全部外资企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如房地产占全部外商房地产的65%,职工人数占全部的60%。英商企业除进出口业务之外,还涉及工业与公用事业、银行保险、房地产、航运等行业,较之美商以进出口为主,有不同的特点。这个调查报告于1958年收录于陈真等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中,由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调查报告还指出,上海英商企业乃是由少数托拉斯所垄断,即为四大集团所垄断。根据调查组列出的表格上的次序,它们分别是怡和、太古、沙逊和颐中。颐中即颐中烟草公司,成立于1934年,就是颐中继承了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的全部产业^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1960年开始就进行了近代中国外资大企业的调查研究工作。由于了解到英美烟公司在上海的档案资料比较完整丰富,我们从英美烟公司着手进行调研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直到1980年代,我们才对沙逊集团和太古集团也进行了调研工作。我们不仅花大力气进行了档案史料的整理收集工作,还收集了大量老职工的口述史资料,经历了大量统计表格的制订和大量的翻译工作,因为很多原始资料为英文。我作为这些调研项目的主持人,非常高兴地看到了成果的先后出版。我们编辑的四卷本《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由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我们撰写的《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我们撰写的《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由于在上海没有找到怡和集团档案,我们翻译了勒费窝的《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华活动概况》一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温故而知新。这次“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下企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①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1~32页。

促使我又重新阅读了以上有关近代中国外资企业的书,感到对近代外资企业在华创业和发展中的若干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解放初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的调查报告指出,怡和、太古、沙逊、颐中是英商四大集团,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但这些大企业的创始资本是否都是来自英国,来华后的发展壮大过程是否完全依赖于英商本身经营管理能力等问题,似乎都还值得探讨。

首先,关于这几家近代中国英商大企业的创业资本来源。我们先看一下英商大企业怡和集团这个号称“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洋行”。它是1932年7月1日在广州设立的,其创办人为苏格兰人威廉·查顿(William Jardine),他从1802年起就在印度东海岸最大海港加尔各答和广州之间航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上当医生。根据习惯,公司的船上职员可以进行一定数量的私人贸易,包括鸦片贸易。“查顿很快就发现这项贸易比做医生更有利”,从而成为巨富。林则徐深恶其人,说:“鸦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该夷为祸首。”^①据说他在不到20年间即已获得100万英镑的巨利^②。以上史料说明,怡和洋行的创业资本实际上来自中国本身而不是英国。

再看一下英商大企业太古集团创业资本的来源。太古洋行在华创业史并没有如此悠久,完全没有涉及鸦片贸易。它是1867年1月1日在上海开业的,1922年又在上海成立了太古轮船公司并成为旧中国外资航运业的巨擘。创始人老斯怀尔是19世纪初英国重要港口利物浦的船商,创办太古洋行时主要是他家族自己的资本。筹措创办太古轮船公司资本时,除老斯怀尔家族的投资外,公司的主要股东还有利物浦其他一些从事中国贸易的商人、曼彻斯特的纺织商人、格里诺克的造船主等。老斯怀尔在上海的对手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也深感:“斯怀尔背后实际上还有英国人所具有的无穷尽的自豪感和资本。”^③笔者认为,旧中国英商四大企业集团中惟有太古的创业资本是真正完全来自英国的。

接着看一下沙逊集团创业资本的来源。沙逊家族作为犹太人在1832年之前定居在今天伊拉克的巴格达有数百年之久,原是当地首富。到19世纪30年代初,由于受到当地残酷的反犹活动的逼迫,逃离巴格达,1832年到达了印度西海岸最大的港口孟买,建立了沙逊洋行,加入了英国国籍,并立即卷入了对华鸦片贸易。犹太史学家罗斯就指出:“这是大卫·沙逊的极大发现,其报酬是:黄金雪片似地向他飞来。”^④较之怡和,它卷入鸦片贸易是个后来者,但由于沙逊善于

①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39~54、43页。

③ 张仲礼、陈曾年、姚欣荣:《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④ 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运用对印度商人预付货款以及从产区预购收割的罂粟等经营方式,怡和最后还是敌不过沙逊集团,最后沙逊是对华鸦片贸易的最大赢家^①。总之,我认为沙逊集团在华创业资本与怡和一样,实际上既非来自英国,也不是来自印度,而是来自中国。

最后看一下颐中前身英美烟公司来华创业资本来源。这次重温我们自己出版的书,发现有一段资料指出:1902年9月29日在伦敦注册登记的英美烟公司资本金为3000万美元,约合600万英镑。出资比例:英商帝国烟草公司方面1/3,美商美国烟草公司方面为2/3。董事长为J. B. Duke(美国烟草大王杜克)。董事中有帝国烟草公司方面6名,美国烟草公司方面12名^②。就出资比例而言,英美烟公司应该说不是英商而是美商企业。最近又重读了高家龙教授的成名作《中国的大企业》一书,发现该书第一章中有一小标题为“在中国的一家美国跨国公司”。高家龙教授指出:英美烟公司在英国注册,但有一个明显的美国身份。美国人杜克一直到1923年仍是英美烟公司董事长。在中国的执行董事从1902~1905年是美国人费斯克,从1905~1922年是美国人唐默斯。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英美烟公司在华创业资本实际上主要来自美国,而不是英国。

关于旧中国四大英商企业集团来华发展业务过程中,是否完全靠英商本身经营管理能力这一点,我也认为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命题。

笔者认为,太古集团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老斯怀尔的“一个值得称道的行动是聘用晏尔吉(Hensy. B. Endicott),一个会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美国人来担任太古轮船公司的货运主管,负责跨国托运人和经纪人联系^③。晏吉尔为何许人呢?他出身于熟悉中国航运事业的家庭,全面了解中国航运业的各方面问题,也了解中国托运人的心理。他精通业务,经验丰富,还同中国托运人和租船人有良好的关系;他还能完全掌握市场信息,也充分掌握有关船只的专门知识,这一切对企业的最后成功,毫无疑问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从1873年到1894年逝世的21年多时间里,一直是太古须臾不可离的人物。可以这么说,他对公司的贡献,是仅次于老斯怀尔的第二号人物。”^④当然,太古集团的中国买办在太古集团发展史上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的郑观应就是太古第一任买办,就是郑观应根

① 参见[美]勒费窝:《怡和洋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③④ 《太古集团在旧中国》,第16、72~73页。

据晏尔吉的经营管理经验,后来归纳为《轮船公司十要》,长期对中国航运业的经营管理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①。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领军人物,英商太古集团的老斯怀尔能跨出家族圈子,跨出英国籍圈子,重用美国人,无疑是他事业上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英美烟公司发展过程的情况,我认为也是一个好事例。可以说,这家公司来华开展业务的头20年是在美国商人主管下发展起来的,主要是美国烟草大王杜克指派的美国烟草商唐默思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唐默思终身从事烟草行业,来华之前曾在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及海峡殖民地等处经营烟业,故对于世界烟业状况如何极有阅历。英美烟公司1902年成立后,唐默思即来香港主管业务,1905年起在上海统管中国业务。后来驻华英美烟公司对他有这样一段总结性评价:“本公司一切之组织系唐默思君所手创,人尽知之,无庸赘述。君之成就伟业,由于君之著有商业上敏锐之眼光固矣;然君若不有一种特异之才干,亦无能成功。此种才干维何,即君能以公平之道礼遇华人,且洞悉华人之特性是也。惟君有此特长,故能使华洋人员同心同德,忠于其事。”^②高家龙教授最近指出:“在比较了公司的西方式行政管理体系和中国社会关系网的利弊后,英美烟公司将大部分责任从行政管理体系转向社会关系网。……此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里,虽然英美烟公司并未废弃其西方式的管理等级体系,但却越来越多地依赖跨国的经销商,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做生意方式。……在卷烟工厂和烟草种植与收购领域,英美烟公司对监管中国工厂工人的拿摩温和协调中国烟草种植者的中国商人也很少直接控制。”^③

以上列举两家近代中国英商大企业在华经营情况并非否定英商的管理能力,倒是肯定他们能不拘一格,善于用人,特别是能了解中国国情,理解中国的关系网,融入中国环境,从而能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的成功的跨国大企业。当前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新时代,面对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新机遇、新局面,更多世界跨国公司 will 进入中国,中国本身的一些大企业也开始大规模投资海外,我希望以上提出的一些有关近代中国外资大企业在华发展史的思考,有其现实意义,有其借鉴意义。

① 《太古集团在旧中国》,第72页。

②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册,第123页。

③ [美]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关于企业管理公司的新思考

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 久保 亨

从企业制度史的角度来看,1930年代产生而其后流行的企业管理公司是极其有意义地存在的。一方面它的确是推动了所谓科学的企业管理,改善了有些企业的经营;另一方面它在1950年代成为了主导公私合营的特种机构。

一、1930年代企业管理公司的产生与流行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所谓“民族资本黄金时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那时的一个特色是以公司组织形式创立的企业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公司企业无论是资本规模,还是设备技术、管理水平等等,几乎都比不上在华的外资企业。黄汉民指出,在以上条件下,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产生了一种“企业公司”的新的组织模式^①。例如,1932年刘鸿生组建了“中国企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把他投资经营的主要企业全部委托于这个企业公司代为管理经营,以便使整个公司所属企业能在“人才之集中”、“财用之经济”、“(科学管理)办法之统一”和“分工之精密”等方面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虽然实力不够的中国企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没有成功,但是,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这样的企业公司的模式渐渐流行了。

那么,为什么1930年代银行主导下的企业管理公司产生了?依据李一翔的分析,原因如下。“由于纱厂的债权人往往不是一家银行,而银行要大规模地经营工业,就得另外成立专门的机构;同时又因为国民政府于1931年3月颁布的新银行法规定银行不得直接经营工业企业,也必须另有机构出面来从事这种经营,于是便出现了多家由银行合组的银团和信托公司来负责经营纱厂。截止1937年上半年止,由银行界投资组成的此类机构有诚孚信托公司、中国棉业公司、中一银公司、扬子纺织公司、汇业银团等”^②。

^① 黄汉民:《抗战时期上海企业公司的兴起与蜕变》,《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

^② 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香港海啸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52页。

二、诚孚信托公司的经营

成立经过。1935 年秋诚孚信托公司发起的时候,它的资本金为 10 万元,暂设于天津,业务则以受托管理动产和不动产为主。公司本身的文件也说到那时的经营“范围不求其大,责任力求其专”^①。之后在 1937 年初,经股东会决议,资本增为 100 万元。其理由是“资金有限,不足以应事业之扩展,且当国内纺织业不振之后,金南两行有关股东,图使资本与技术合作有以振革之,而以诚孚注重棉类企业之经营”^②。另外,股东临时会“以津埠市场日见萧条,公司业务主持人复多留上海”决定公司迁沪,天津设分公司^③。不过,实际上,诚孚信托公司改组的直接目的是新裕纺织公司的经营改革。因为那时新裕纱厂的改革成为金城银行最大的课题之一。1931 年新裕纱厂的前身溥益纱厂倒闭,而金城、中南两行开始管理。其后银行方面再三尝试经营改革,不过其结果都有界限。最后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终于找到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信托公司实行经营改革^④。

成立背景。季崇威介绍了当时戏剧性的背景。在 1934 年前后,为了复苏棉纺工业,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进行了一项调查。那时原棉方面由邹秉文负责,技术方面由童润夫负责。经调查各厂情形后,认为纱厂自身组织不健全、经营不得法、资金薄弱是亏损的主要原因。当时日本在华纱厂营业蒸蒸日上,而且华商不能经营之厂一入日本人之手,继续经营,即调度有方,措置裕如,成绩斐然,由逆境转趋顺利。因此感觉日本人能办到的国人亦未尝不可办到,只要合理化经营,深陷困境的纱厂,应彻底改组。于是棉业统制委员会等开会讨论建立两种公司。一个是棉业贸易公司,而另一个是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专门负责纱厂的管理经营和资金调剂,技术改进,把负债过多无法经营的厂加以接收改组,仿照日本人的经营方式,科学化管理。不过那时由于国民政府的财政支绌,组织两种公司的计划遂告搁浅。于是大家商量,不如商业银行自己先合作着手推动这个整顿工作。这是诚孚信托公司的改组和管理纱厂的背景^⑤。

经营内容。在 1942 年 11 月时,诚孚信托公司受托管理企业如下^⑥:

①③ 《诚孚信托公司》(194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档案号 198-1-7。

② 同上书,引用文中的“金南两行”指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

④ [日]久保 亨:《战间期中国之棉业与企业经营》,汲古书院 2005 年版。

⑤ 季崇威:《诚孚公司的历史与现状》,《纺织周刊》第 9 卷第 7 期,1948 年 2 月。

⑥ 久保 亨:《战间期中国之棉业与企业经营》。